

# 《历史与理论》论文提要

*History and Theory, Published by Wesleyan University*

2012 年 10 月号

## 1. 保罗·A. 罗斯：《多重的过去》

作者希望指出历史知识在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领域的新的可能性。分析哲学传统之下由丹托（Danto）和达米特（Dummett）等人代表的学派试图在两组共有前提下解决“过去”是否实存的问题：其一，个体命题是语句分析和哲学分析的相关单位；其二，各式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已经穷尽了形上学在实存问题上的可能选项，并由此确定了知识论的可能形式。但作者认为，这两个前提都应遭到拒斥，而代之以非实在论。在列昂·戈德斯坦和依恩·哈金成果的启发下，文章首先阐发了非实在论史观，主张对历史的声言应受到和其他关于经验或科学知识的理论一样的约束；“过去”不可作为客体而被“发现”，因为它本是人为构建的产物。非实在论强调，分类应优先于知觉，理解在先、考证随后。因为分类并不需要任何先验的支撑，那些认为某种单一结构必须或必然决定人类历史的断言就失去了意义。非实在论否定了实在论中对任意可想象观念的可辨识性。换言之，非实在论否认过去一种恒存（subsisting *sub specie aeternitatis*）的已被决定之“过去”。“过去”是多重的，因为我们对过去的建构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描述”和“体验”在社会调节下所达成的一致。

## 2. 荣尼·马蒂·库坎恩：《科学史编纂中缺失的叙事转向》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间兴起的“叙事转向”深刻改变了对一般历史的讨论。通过拒斥兰克的历史实在论，史学的研究焦点转向了史学家的叙事者身份和历史叙事的文学创作属性。然而，对科学史的研究却在同期转向了截然相反的研究方向。科学史编纂中的“社会转向”强调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唯物的、实用性的行为所具有的可供记录存档的特质。经验主义对该学科的渗透如此之深，以致科学史家大多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仅凭对科学实践的叙述就可直接描述科学史，而无需强调史学家作为描述这些实践活动的叙事者的角色。当代的科学史家大都对科学描述其研究对象（“自然”）的能力持审慎态度，却往往忽视自身在描述其研究对象（“过去的科学”）时的局限性。作者认为，一场姗姗来迟的叙事转向将推动科学史的研究。

## 3. 彼得·巴艾尔编、戈登·C. 韦尔斯译：《论辩极权主义：阿伦特与沃格林的一次书信往来》

1952 年，《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的创刊编辑瓦尔德梅尔·古里安请时任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埃里克·沃格林就汉娜·阿伦特刚刚发表的《极权主义的起

源》撰一书评。古里安并请阿伦特本人作文回应，再由沃格林撰文总结。在这次学术对话展开之前，沃格林致书阿伦特，预陈书评大意；阿伦特也很恳切地予以回复（其德文所撰的回信从未公开发表）。阿伦特撰写了两稿作为回复。在篇幅较长的第一稿中，她别开生面地阐述了对多元性、政治和哲学三者间关系的思考，并援引了她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诱人“逻辑”的观点。但是，沃格林收到的是篇幅较短的第二稿，这导致沃格林误读了阿伦特的论点。文章附有沃格林的去信及阿伦特两稿回信的翻译。作者所撰的导言比较了阿伦特两稿的异同，介绍了相关语境，概述了阿伦特和沃格林对彼此的印象，并突出对比了两人在政治性宗教和人性上的观点，以及两人的书信体对话在《政治学评论》上所引发的辩论。

## 书 评

### 1. 伊丽莎白·迪兹·厄玛斯：《“历史之矜简”的持续》——评《怀疑论历史：女权主义与后现代方法的实际应用》

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批判传统历史书写方式的风潮。它虽非一人一时之功，然其实际影响已广及西方社会，尤以英语国家为著。这一风潮牵涉甚广，如表现性历史书写（representation）的衰落，对因果律本质的探讨，对“身份”的不同定义，时间和系统，等等。传统派史学家恰如其分地将现代史学批判视作对他们所熟稔的种种工作前提的挑战——倘若批评成立，何必将历史研究局限在某种特定的工作范式之内呢？不出意外，史学家们——尤其是奉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北美史学家们——达成了默契，团结起来抵御这股批判风潮。但即便是在北美英文学界，20世纪以来的知识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亦已令传统史学方法再难维系一木独大的局面。依作者看来，那些身负教导年轻学子重任的学者未能投身这场变革，实非学界之幸。当前的史学创新之所以局面未开，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实不足以应对前述的种种难题：单一学科的研究甚至不足以对难题明而辨之，遑论创造性地解而决之？虽然人人都在口头上给跨学科研究以赞誉和支持，但多数的专业学会、期刊、出版社和研究机构缺乏对其在实质上的鼓励。跨学科研究所触及的，不止是学界学科细分的常态；跨学科研究者跨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必需的谦逊心态常与学界各类机构组织所标榜的“专业性”产生摩擦。即使在象牙塔之外的炫目社会中，有志于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也面临如何适应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假深思地运用特定的关键语汇（“语言”、“言说”、“相对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时间”、“差异”），却未能在其确切定义上达成共识——这最终导致了当下语言的混乱，一如费里尼电影《罗马风情画》（*Fellini Roma*）开篇所描绘的那场交通大堵塞。文章的讨论归结于博尔赫斯（Borges）和他的短文《历史的矜简》（*The Modesty of History*）。

### 2. 约翰·E.托沃斯：《当边缘成为中心：马丁·杰伊〈边缘上的散文〉一书中作为历史批判的思想史研究》——评《边缘上的散文》

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集中探讨了他对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着力探讨的一系列思想主题的反思、增补和修正。这些主题包括历史总体化（historical totalization）的正反辩证法，如何认识与运用对“体验”的不同定义，视觉文化以及视觉体制（scopic regime）的本质，以及公共领域内建构真理时的两难局面，等等。文章认为，杰伊近期的作品显示他逐渐倾向于认同阿多诺和德里达的并列（paratactic）和解构思想，并视二人为制

造适合于历史意识和历史批评的代表。文章同时试图探索杰伊在这一学术过程中将如何重新表述以下问题：历史性的真相表述，反映成员一致意愿的集体身份，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以及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

3. 西萨瓦·库提卡：《何种史学家？观念史与观念的历史：论其复杂之学统及新近的发展》——评《政治观念与时间》

这本由亚伟尔·斐南迪斯·塞巴斯第安编辑的论文集不但有力回应了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重要著作《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也为历史书写(history-writing)方法论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此书着重探讨了观念的多义性，并研究了其作为“思想载体”(vehicles for thought)在社会中兼具实用性和沟通性的作用。其对观念史作用、意义和未来的分析尤能发人深思。此书所收录的13篇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词语和观念、语义与历史变迁、语境和言说等的相互作用。塞氏从国际学界的不同学科和领域召集了专家，希望以跨学科合作解决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厘清理论与实践间的复杂关系。在科泽勒克的影响下，本书重新审视了史学家乃至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的不同途径。在学者研究已逝的事情之时，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contingent)而流变的、可撤销的语义单位所表达的：正是这些语义单位形塑了我们所处的多元文化世界。基于对历史可塑性的洞见，本书也探讨了一个看似明显却不乏挑战的问题：我们如何处理日常经验中的时间及其单一或多元的表现(representations)。在探索本书所讨论的具体史学问题时，作者亦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并着重回应了其对思想史研究的批评。作者通过反思书中所详细评述的史家，来概括其代表的治史方法。作者认为，思想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意义时往往乞灵于“创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而这种书写历史的范式既可增进我们对多重史料的理解，亦可克服历史学不同分支间的矛盾分歧和门户之见。就此，作者着重阐述了自己融汇观念史和思想史的主张。

4. 盖布丽艾尔·斯皮格尔：《最后阶段》——评《被厌弃与被抹去：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劫后余生》

文章评论了卡罗林·迪恩的近著，其主旨在阐释针对“过剩记忆”(surfeit of memory)以及犹太裔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不满。这种意见认为，犹太人在二战的遭际受到了特殊待遇，其遭受的屠杀成为了现代极端暴行的典型代表，并主导了对劫后幸存者的一般性讨论。这导致多个族群竞相争取受害者身份，以便在换取对其痛苦经历的认可的同时，伸张自身关于正义的主张。迪恩认为，主流社会对这类行为的不满导致了反受害者舆论的生成，并最终导致了一种对暴行受害者的厌弃心理。这种心理主要表现为对受害者所陈述劫难正当性的拒斥；对犹太裔受害者而言，则表现为对其忽视其他受害者族群的不满，以致将其视为“加害者”。同时，迪恩认为，要求受害者以“极简主义”(一种已难于创新、在美学上极受约束的体裁)陈述其遭际的做法在根本上消除了极简叙事所试图重现的精神创伤，从而削弱了受害者记忆的合法性。作者认为，关于大屠杀回忆意识及其再现方式的争论为历史学和伦理学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诘问。如何将过去恐怖的创痛体验纳入一般历史抒写的规范？这要求历史书写者保持自身与对象的距离、以客观而具有阐释性的批判为鹄的。整合恐怖，意味着历史再现将必须承认并接受在分析层面上复原的“事实”与受害者证言有着不同的史学合法性。史学家需要在质疑受害社群“声音”真理性的同时，将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实事求是地理论化。

5. 杰夫瑞·安德鲁·巴拉什：《卡西尔、海德格尔与达沃斯的遗留问题》——评《分裂的大陆》

多数史家认为，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海德格尔 1929 年于瑞士达沃斯展开的激辩，标志着 20 世纪欧洲思想的一大分裂。彼得·E. 戈登（Peter E. Gordon）的近著着重研究了这场哲学宿敌间的辩论。戈登考察了辩论的背景，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辩论的历史影响。戈登纵贯全书的考证，从卡西尔“自发性”（spontaneity）哲学和海德格尔“接受性”（receptivity）或“抛掷性”（Geworfenheit，即将人的有限存在抛入其绝无可能驾驭的境遇）哲学的角度解释了二人分歧的根源。文章认为，戈登此书为我们理解二人的辩论及其对 20 世纪欧洲思想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文章亦批判性地审视了戈登对二人哲学分歧的解读方式。作者认为，戈登的解读架构未必能够囊括达沃斯辩论，其分析很有可能忽视了这场辩论的一些重要方面。

6. 安通·德·比茨：《非人道性能孕育人道性吗？对一个悖论的研究》——评《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上的人权》

文章所要探讨的中心命题是：非人道性孕育了人道性。当然，这个命题的论证牵扯到许多问题：我们能够言说人类的非人性吗？为什么 18 世纪前的大规模的非人行径没能导致一套人权维护体系的建立？18、19 世纪间人权运动的萌发是由非人道行为激发的吗？为什么这次人权运动未能延续？为什么人权理念在 19 世纪隐而不彰，却在 1945 年后光芒大放？战争和种族灭绝是人权运动在 1945 年后重新兴起的唯一肇因吗？如否，则其他原因为何？1977 年人权运动成功转型为群众性运动，又是否与任何非人行径有关？最后，自 1998 年以来延续至今的对人权的热情，是否足以一劳永逸地防范非人道暴行？作者的结论是，在历史上，的确有由非人道暴行激发的人道运动，但更多情况下，非人道暴行只导向了冤冤相报的死结。如果“不仁育仁”的命题为真，则我们尚需要更多的人权灾难来激发人权事业的进步：这将是一个自我矛盾的悖论。

7. 威廉·H. 斯维尔：《经济史怎么了？》——评《计量史的贫困：重建经济史》

在其火药味十足的新著中，弗朗西斯科·博蒂佐尼试图证明经济史研究已到了死水一潭、亟待重建的境地。博氏认为，经济史已被改造为经济学下的附属学科，并完全接纳了主流经济学界盛行的反历史的先验知识论，这意味着经济史已然丧失了其史学属性。博氏希望能迫使学界承认当代经济史的破产，并指出了他眼中的经济学重生之路。他批评罗伯特·福格尔等人的经济史是回溯性的经济计量学，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笔下的经济史则论为了制度经济学的新兴分支。博氏提出，经济史不应仅仅满足于演绎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更应回归以观察归纳实际经济生活为主的传统治学之道。他不但号召学习维托尔德·库拉、摩西·芬利以及年鉴学派前辈的经典作品，也赞扬了经济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学术观点。博氏对经济史归纳研究法的呼唤可谓正得其时，他对先贤作品的品鉴也令人回忆起经济史曾经的创新活力。但博氏一书的建议似乎更适用于研究前现代历史的史学家们。与其说“自我调控的市场”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纯粹是经济学家的虚构，倒不如将之局限为仅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假说来得稳妥。博氏的论断（即“每个社会都有着只能借归纳发现的独特的经济生活形式”）似无力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横扫全球、形塑社会的现象。总之，博氏对经济史的批判和建议无疑有其价值，但他重建经济史的计划与他自期的目标还有相当之距离。

## 2012年12月号

## 1. 乔治亚·万克：《伽达默尔诠释的团结性和传统》

评论者们已对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对传统的关注和他在此后作品中对团结的关注进行了比较，认为后者表明他从关注本体论转向了关注伦理学和政治学。然而，文章在伽达默尔本人观点的指导下，认为无论是他早期、晚期的作品以及《真理与方法》一书，都始终关注伦理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因此，作者想对那种认为所谓伽达默尔的“团结性政治”（politics of solidarity）标志着其作品的一个新方向这一观点提出挑战。伽达默尔把“团结性政治”从其既有的必要前提（例如宗教和民族）中分离开来，就这一点而言，这的确标志着他在探讨团结性之时出现了新的方向。与《真理与方法》相比，伽达默尔后期的作品也许更为清晰地涉及了差异性和其他问题。但是，作者认为，伽达默尔的“团结性政治”以及他对“他者”（otherness）的关注并不表明他的新方向，而是使得他早期对“传统”的论述中本已具备的重要特征更加突显出来。

## 2. 陈素芬：《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家对待传统的实用取向》

文章探讨了儒家对过去的尊崇及其对传承圣人传统所做的努力。所涉主题的历史背景是：五四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抨击，强调科学的“救亡”之路，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的现代化也采取了类似取向，通过市场改革把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体系之中，近年来儒家思想又出现了复兴。本文重新探讨了约翰·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对杜威和胡适的著作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认为他们对传统、科学和现代化所持的看法其实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平衡。实用主义者在主张个人和群体发展的同时，认为应该改造而不是毁灭传统。杜威继承了启蒙运动以进步为导向的历史观（有人认为这是现代西方史学的特点），它虽与中国传统中以史为鉴的历史观不尽协调，但在实用主义对传统的重构和儒家对传统的崇奉之间仍有会通折中的可能。作者支持以一种儒家实用主义的（Pragmatic Confucian）方式处理中国传统，以便在有所择取地传承传统时，不失进步创新的灵活性。

## 3. 扬·卢森：《传统：历史感生成的原则、逻辑及其在历史文化上的效果》

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实例。第二部分解释了历史感生成的意义。第三部分将传统定义为一切历史性思考的预设前提，而这种条件的限制凸显了历史建构论的片面性。第四部分将传统表述为历史叙事的四项基本感觉准则（sense criteria）之一。第五部分讨论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以此收束全文。历史感生成指一种通过解释过去来理解现在、进而预测未来的思维过程。该过程普遍存在于人类的文化实践，进而导致时序的概念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向度上的必要性。今天，学界在考虑元历史（metahistory）时多认为历史感的生成是建构性的。对过去的感觉被解释为赋“过去”以意义的过程；“过去”本身则显然受此影响。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过去”已在现存的情境和条件之中。而“传统”即是这种存在。在史学家构建历史之前，其自身已经被“过去”在世界中的发展结果所建构。这样，即使在“过去”被书写为历史之前，传统已然且必然地在历史性思维中发挥作用。历史感的生成需要有关感觉和意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的支持。通过应用这些原理，我们可以将对“过去”的感觉转化为现下的富有意义的历史。在文化差异之外，对“过去”进行历史意义上的认识需要四种感觉准则。作为四者之一的“传统”是认识“过去”的其他模式

的根本基础。它为人类世界提供了时序变化，从而维系着世界在变动中的有序性。自所谓高等文明出现以来，其他类型的水平性叙事遮蔽了传统的建构性作用。尽管典范性、起源性和批判性方法补充了历史叙事，传统性叙事仍然是最常用、最基本和最流行的。

#### 4. 菲利浦·庞裴尔：《俄罗斯国家权力传统的演进》

文章从进化角度探讨在俄罗斯史上不绝如缕的专制或寡头性的个人统治。文章的第一部分综览了俄国政治史，指出除了被数个短暂的“困难时期”打断外，个人统治是俄罗斯五百年来的常态。文章随后探讨了对这种现象的两种理论解释。爱德华·基南（Edward Keenan）的假说认为这是俄罗斯在长时段下对艰难环境的应对之道。理查德·赫利（Richard Hellie）的理论强调针对公职阶层的革命，以及俄罗斯精英为克服俄国的相对落后而选择的方案所造成的循环模式。二者都未能采用新达尔文主义的理路。文章的第二部分详细探讨了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方法。在“大历史”的宇宙观下，人类在其短暂的存在时间中对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加速。生物学家对复杂系统的建模研究对此亦有类似结论。人口学家诺埃·博诺伊（Noël Bonneuil）所构建的“能动的历史”模型不但质疑了传统历史学家处理“人类历史时期”时的单进程叙事，也批评了其他进化论模型中的固有偏见。将进化论施用于人类历史研究时，不应仅仅着眼于生物性的繁衍，更应考虑到演进中的人类技术群体、社群工程等衡量自然选择的单位所兼具的促进进化的力量，以及寿命更长的人群。文章的第三部分将前述方法应用于对俄国国家权力传统的研究，揭示了社群工程如何在一系列现代权力系统中扮演了促进进化的作用。“部落寓言”断言，在任一给定的权力系统中，能动方（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军事抑或政治）主导着系统的运行机制。这种“辫状流”（braided stream）方法虽然尚不完善，却可以揭示能动方主导下的诸多现代权力系统是如何互相影响、共同演进，并产生混合形式的。俄罗斯的国家权力传统在进化论的语境中得以凸显。

#### 5. 梅约翰（约翰·马克汉姆）：《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学科化：两个案例研究》

文章强调了知识本土派（epistemological nativism）在现代中国对传统的学科划分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的知识本土派认为，中国思想遗产的表达和发展，只能用所谓本土（或曰中国本位）视角的范式和规范来进行。文章通过两个案例来揭示现代中国在划分传统学科时所遇到的一个难解之题：如何处理中国哲学和国学的关系。文章的案例研究也为反思传统在中国现代性中的意义提供了契机。在中国哲学领域，本土派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颇为流行的对回归到某种纯洁而未遭到“西方”哲学影响的中国形态的呼吁，其二是对构成中国哲学的复合身份的其他思想传统之多元性的持续抵触。为了阐明第二点意见，作者重点集中于本土派对佛学传统及其印度根基的显而易见的忽视上。在第二个案例中，作者认为，国学之所以能作为一门迥异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科目而得到复兴，正是凭借了“国学代表了一套整体性的学术”的说法。国学与其他前现代学术传统的联系建立在一种浪漫的幻想上，即前现代的诸多学术传统以某种莫名的形式构成了一套整体性的、甚至是有机性的学术体系。持这种看法的当代国学倡导者因而面临这一两难局面：愈强调国学的跨学科地位（因此容易再将国学加以分支学科的离析化），则国学愈难以自成一完备的学术体系。当我们注意到“国学”传统的虚构性时，这一问题益发明显。

#### 6. 郑杭生：《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

文章试图从社会学的视野，结合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即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实际，

对现代性进程中“传统”变化的某些规律性，或说“传统”的现代性变迁的某些规律性，进行力所能及的梳理。文章通过那些研究“传统”不可避免的关系，如传统与过去、传统与“原生态”、大传统与小传统、旧传统与新传统、传统的重构与新构等，来揭示包含在其中动态而稳定的本质性关系。这样的分析表明，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历史，那种对传统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或全盘肯定的历史保守主义，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这个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7. 伊桑·克莱因伯格：《回到我们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和德里达论传统和历史》

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和德里达都曾以回归传统文本的方式来克服他们眼中的现代思想危机或缺陷，文章通过研究他们的不同方式来探讨“传统”这一话题。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意味着回归苏格拉底之前的“早期希腊思想”；对列维纳斯而言，这意味着回归犹太教经典《塔木德》；对德里达来说，则是回归那些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文本，包括柏拉图、笛卡尔、卢梭和马克思在内。然后作者想探讨这些反思是否可以回应史学界三种经久不衰的思潮，即实证主义、玄思主义（或目的论）和建构主义。

〔译者杨光烁，美国维思里安大学〕

## 第七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将于 11 月举行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历史学前沿论坛拟于 11 月举行。

此前，《历史研究》编辑部已分别与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举办了第一届（2007）、第二届（2008）、第三届（2009）、第四届（2010）、第五届（2011）、第六届（2012）历史学前沿论坛。

第七届论坛的主题是“交叉与对话：多学科方法与历史学研究”，主办者热切期望学界同仁从史学理论、实证研究、文献考订等不同方面凸显主题，撰写高质量、高水准论文，会议论文将择优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上刊发。